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主编 邓如冰

中文前沿

201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主编 邓如冰

副主编 周琳 周晨萌

中文前沿

201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文前沿. 2017 / 邓如冰主编.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663-1795-7

I. ①中… II. ①邓…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2653 号

© 2017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前沿 2017

邓如冰 主编

责任编辑: 强晓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1.25 印张 220 千字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1795-7

定价: 35.00 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 勇 (北京师范大学)

刘 珣 (北京语言大学)

张 黎 (北京语言大学)

赵金铭 (北京语言大学)

戴锦华 (北京大学)

海外顾问

Imre Hamar (匈牙利罗兰大学)

Philp Williams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

柯传仁 (美国爱荷华大学)

Andrew L. Maske (美国肯塔基大学)

修华静 (美国肯塔基大学)

郑冰寒 (英国杜伦大学)

编委会

主 编: 邓如冰

副主编: 周 琳 周晨萌

编 委: 孙勇进 胡少卿 唐兴全

曹 晋 韩沛玲



中国语言文化及其海外传播研究

再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	邓如冰	3
汉字学视域下的北魏《郑长猷造像题记》	杨 宏	10
英国孔子学院中华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曹欣研	18

东亚文学文化共同体

江户汉诗中和歌元素的融入	祁晓明	29
江户后期福山藩儒学教育机构研究	蒋春红	42
《桂苑笔耕集校注》第一、二卷补正举隅	孙勇进	51

小说研究

当代西部小说的“诗意”及其命运

——从陕西作家温亚军的小说谈起	张晓峰	63
浅析莫言《生死疲劳》的东方魔幻现实主义	陈 旭	72
密约幽欢欲偕老：宋代小说中呈现的民间爱情	罗陈霞	77

汉语教师与汉语教材研究

从汉语教师志愿者考试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	董 瑾	113
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的语音规范问题初探	夏丛生	118

《赢在中国——商务汉语系列教程》基础篇研究	王 坤	125
-----------------------------	-----	-----

北京话与北京文化

晚清民国京味儿小说大家徐剑胆作品考述	刘 云 王金花	139
--------------------------	---------	-----

课程建设研究

诗意启蒙

——论唐宋诗词选讲课程建设	杨立群	151
---------------------	-----	-----

二语习得理论研究

国外概念迁移实证研究综述	周 琳	163
--------------------	-----	-----



中国语言文化及其
海外传播研究

再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

邓如冰

摘要：从上古到近现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一个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中国文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是在现代的“世界”观的发动下，开始“走向世界”。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因而“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也承载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世界；走向世界；古典；现代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在上古时代，先人们以其惊人的想象力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宏伟辽阔的“世界”图景：“北冥”、“南冥”，即“北溟”（北海）、“南溟”（南海），与地理上事实存在的“东海”和想象中的“西海”，以及其他语意相似的“四海”、“四极”、“四荒”等等，共同勾画了那辽远的世界边际的模样——黑而深的海水以及如海水般不可知的荒晦绝远之地。“四海”、“四极”之内，便是海水包围的陆地^①，以及陆地的中央之国——“中国”，也被称为“中原”或“中土”，这里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这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四海”为边际的地缘结构，就是上古人对于“世界”的基本想象。

“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古代中国人将“世界”生动而直观地描写为一种“天圆地方”的空间结构。这个空间结构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性，二是封闭性，三是浓重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似乎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立于陆地中央“中国”（或“中原”、“中土”）的巨人，四下远望，目光的尽头便是“四海”。他看见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有极点，地有中心；人类及万物栖

息生长于大地；而天之“道”却是大地上一切秩序的源泉。^②这个长空笼罩大地的封闭式空间，很容易令人想到另一个常见的语词——“天下”。当然，在古代中国，“天下”并不纯然是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它同时是一种政治文化表达——通过“天下”与“天子”的必然联系，确立了统治者对世界上所有土地、臣民、物品的控制与所属关系。在这种“天下观”的观照下，“天下”与“世界”常常是同构的，“天下”几乎等同于整个“世界”，“世界”万物均属于“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皇天眷命，奄有四海”（《尚书·大禹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就是这种具有整体性的“大天下”的思维模式的体现。古代中国人在思考“中国”与“四海”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中心主义”特点尤其明显，“中国”“作为一种理念，指称普天之下‘正统’、‘中心’”^③，而散居于“四海”的却是“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尔雅·释地》），他们离“中国”越远，地理上就越为荒僻，心理上就越隔膜，文化上就越落后，越是有必要接受“天子”的教化，“德化四夷”。简言之，这个“天圆地方”的“天下”（“世界”）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是一个封闭的整体空间，以“中国”为中心向“四海”之外进行文化辐射，其最高统治者是“天子”，其文化核心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原文化”，其运作机制为一整套以统治者为中心的礼乐制度和人伦秩序，它们维持着空间的自足运行，“天下”得以代代相传，“世界”于是生生不息。这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古典的“世界”观。

直到近现代，这一古典的“世界”观才被打破。学者王富仁曾经非常具有启发性地从“空间”的角度来论述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问题，他认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完成了一次“地理大发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西方世界’，发现了一个新的空间，他们的整个宇宙观才逐渐发生了与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变化。”“这个‘地理大发现’却不同于西方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张骞通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三宝太监下西洋。这些发现都没有改变发现者本人的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观念，都没有造成他们本人空间的分裂和破碎感。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理大发现’，发现的却是一个无法统一起来的世界，一个造成了空间割裂感的事实。”^④对于近现代中国人来说，“空间割裂感”是一个极为新鲜又极具冲击力的体验，尽管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甚至是更遥远的古代，当中国人的脚步踏上异邦土地的那一刻，“世界”就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了，但那时的“世界”是那个封闭性、整体性的“天圆地方”的“天下”，对于那时的人们而言，不管走多远，都是行走于同一个“天下”，而由于“中国中心主义”的作用，“天下”常常被混同为天子世代所辖的“中国”。而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发现除了“中国”这一空间以外，还有其他空间与自己生存的空间并置着，其文化、制度、运行法则都与自己的空

间如此不同。过去的“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式的整体空间真正分裂了，海水不再只包围着一个大陆，而是四处联通着，陆地被其分裂出多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根据自己的文化逻辑自足自在地运行着。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古典的“天下”观就不复存在了。“天下”观的瓦解抽空了近现代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基础，使他们经历了一次至关重要的精神冲击和观念改变：从古典的“世界”观转向了现代的“世界”观。

现代的“世界”观是一种将“中国”与其他空间进行分割检视的观念。只有在这种分割的并置空间的结构中，才真正存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的可能性，“走向世界”这一说法才能成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的“世界”观开启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中国之外的空间文化的冲击下，开始了对东方/西方、民族/世界、传统/现代、先进/落后等重要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也开始了痛苦而伟大的现代转型。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中国文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同样也是在现代的“世界”观的发动下，开始了“走向世界”的漫漫征程。

二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文学进程时，首先提出的便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这一命题：中国文学在19世纪末经历了艰难而漫长的“阵痛”之后，直到“五四”运动，终于完成了与中国古代文学全面的深刻的“断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越过了起飞的‘临界速度’，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⑤在这里，暂且不对“走向世界”与“走向世界文学”进行甄别，需要看到的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两个说法（以及类似的说法）背后的动因是一致的，即所谓的“断裂”、“阵痛”、“汇入”都是因为看见了“中国”与中国之外的“世界”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而且是如王富仁所说的“没有均势关系的倾斜着的空间结构”^⑥，这种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感，使人产生鲁迅所说的“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恐惧与焦灼，从而滋生了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因此，“走向世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上，是一个具有原动力性质的极具历史意义的重要表达，有论者认为“‘走向世界’的理念具有发动机的作用”^⑦，这个看法并不夸张。

诚然，中国之外的“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地理板块及其附属的文化价值。近

现代时期,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屈辱性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以及许多知识分子奔赴英、美、法、德、日等国学习并“学成归国”所带回的异域体验,“世界”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可能指向不同地域,但是总的来说,以英美为主的欧美国家(即我们常说的“西方”)和日本构成了这一时期“世界”的主要面目^⑧,因此有学者认为“一个潜在的日本/英美的体验结构”对于近现代的文学发生发展的总体面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⑨1949年以后,西方和日本的影响迅速消失,随着中国与苏联在政治、外交、工业等全方位的合作,中国文学工作者认为苏联文学是“人类最先进的、最富生命力的文学”,是“我们学习的范例”^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很自然地屏蔽了西方诸国,“世界”变成了苏联(以及部分亚非第三世界国家)。有学者这样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期间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经历了17年单方面向苏联文学学习,随后是10年‘文革’时期的闭关锁国”。^⑪这样的总结虽然不免简单,但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了此间我们看“世界”的主要面目即为苏联。此后的“文革”十年,中国人终止了“走向世界”的脚步,饱受封闭之苦,再度开启国门的时候,“走向世界”的呼声就显得格外急迫了。

现在已经很难追溯“走向世界”这个口号式的表达最初是在怎样的语境下提出的了,但毫无疑问,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走向世界”如此具有号召力,以至于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语,被广泛使用于整个中国社会之中。究其原因,正如学者李怡所说:“‘走向世界’代表的是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⑫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看,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多个文学潮流如意识流小说、朦胧诗、实验戏剧、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先锋文学等都与外国文学有着明显的联系,清晰地显示着作家们对于“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从文学研究的角度上看,“走向世界”的渴望同样炽烈,几次与此主题相关的文学活动,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1985年曾小逸主编的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丛书出版,丛书名称就是“走向世界文学”,收集了多篇关于外国文学影响中国作家的研究成果,他本人也写了四万余字的论文《论世界文学时代》,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是在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进行了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著名的讨论,首先谈及的话题就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1987年,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出版,开卷语的第一句就是:“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⑬“走向世界”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也一度是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三

显然,“新时期”以来的“世界”要比1949年以来的那个单一的以苏联为主的“世界”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简单地以几个国家的名字指称此时的“世界”似乎也已不可能。而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的深入,对“走向世界”的争论也远远多于以往的时代。在文学研究界,“走向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口号,一方面,拥护者通过描摹仿佛大同世界般的“世界文学”的壮丽图景,理想主义式地号召着中国人走出封闭、融入世界、拥抱全球化;另一方面,它又一直被质疑者揭示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圈套,因而陷入一次又一次的争议和质疑中。尤其是借助“顾彬事件”这一类的“契机”,学者们的追问更加直接:所谓“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到底是“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⑭不少学者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所谓‘世界文学’在中国人的想象里,基本上也即是‘西方文学’的同义语。”^⑮“‘世界性’是西方的世界性。”^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西方”指代了“世界”,中国却落入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的窠臼,这是让人倍感沮丧的认知。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走向世界”是一场心情复杂的旅程,也是一种“共同的心理情结或症状”,说明“‘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关切乃至焦虑。”^⑰

必须看到的事实是,尽管争议不断,“走向世界”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式微过。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形象的提升,“走向世界”的呼声有增无减,其内涵也从以往单向度的“认识世界”,扩容为同时“被世界所认识”的双向交流,类似“中国需要认识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的口号式的表达随处可见,中国人希望被“世界”了解的愿望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言说着。与此同时,学界对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的讨论日渐热烈,研究队伍也呈集团化和体系化之势。新世纪以来,多所知名大学和期刊曾发起与其相关的研讨会,如“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复旦大学,《中国比较文学》,2000),“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2003),“世界汉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中国人民大学,2007),“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当代世界文学》,2008),“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北京大学,2010),“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北京师范大学,2010),“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北京师范大学,2013)等。部分大学也设立了专门研究此课题或与此课题相关的研究机构,如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等都设有“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等。此外,“走向世界”不再是属于作者或学者的民间话语,它同时也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并与构造中

国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战略目标”^⑬结合在一起，推动着官方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从经典翻译、图书出版等渠道铺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之路。当下，一个从民间到官方全民性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瑰丽图景正在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一代代学人对中国文学与“走向世界”相关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进行的。其中既有近现代中国人通过“地理大发现”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转型的历史驱动，也有在当下“全球化”时代中，作为文学研究者，如何在世界格局中定位和发展中国文学的现实焦虑。事实上，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将来，“走向世界”都会是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宏伟目标，会鼓舞着更多的学人将与之相关的研究一直延续下去。

注 释：

①顾颉刚、童书业认为“最古的人实在是把海看做世界的边际的”。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三四合期。

②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和历史生成》里谈到中国人的“天下观”具有四个特点：（1）天圆地方的空间结构；（2）天人一体的有机秩序；（3）道、王合一的绝对中心；（4）“以文化世”即以“文化”对包括夷狄在内的自然世界进行规制的文明机制。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和历史生成，学术月刊，2012（10）。

③张未民：何谓“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文艺争鸣，2009（9）。

④王富仁：时间·空间·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鲁迅研究月刊，2000（1）。

⑤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

⑥同①。

⑦程光炜：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12（8）。

⑧需要说明的是，英、美、日本等国在彼时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世界”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之内。以鲁迅为例，除了日本文学外，他还相当重视俄罗斯及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

⑨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

⑩周扬：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28。

⑪刘洪涛：从国别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

⑫李怡：“走向世界”“现代化”“全球化”——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汇，南京大学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2001（3）。

⑬“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文化：中国与社会：第一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1987: 开卷语.

⑭蔡翔. 谁的世界, 谁的世界文学? ——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商榷. 文汇报, 2007.

⑮张清华. 身份困境与价值迷局: 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处境. 文艺争鸣, 2012 (3).

⑯陈晓明. 与世界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 张清华. 当代文学的世界语境及评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

⑰吴俊. 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的焦虑. 南方文坛, 2012 (5).

⑱201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字学视域下的北魏 《郑长猷造像题记》

杨 宏

摘 要：《郑长猷造像题记》于北魏孝文皇帝景明二年（公元 501 年）刻写完成，历代学者对这通碑刻的评价褒贬不一，从汉字使用和书写角度来看，83 个清晰字形中空格、漏刻、文字重复、异写现象严重，但没有使用当时通用的简体字形；文字排列比较整齐，推测当初书丹之前应该在石壁上打了界格；通过对字形的综合考察，我们认为《郑长猷造像题记》在龙门造像题记中书丹、刊刻水平并没有康有为先生评价的那么高，但也确实不是最末流的；对历史上的石刻作品应结合其出现的地理位置、刻写工序、写手刻手等具体情况从汉字学、书法学等多角度综合研究才能得到全面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北魏；汉字学；郑长猷；书写；刊刻

中国历史上的北魏又名后魏，是鲜卑拓跋部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在大约 150 年间，民间佛教思想盛行，开窟雕塑弥勒佛、观世音像成为社会风气，在佛像附近往往还要刻字记录造像原因、造像者、发愿内容等，这就是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就是北魏时期洛阳龙门石窟中最为著名的二十篇佛教造像题记，《郑长猷造像题记》是其中之一。

《郑长猷造像题记》因书法、美学价值获得极端评价而早就为人注目。康有为先生认为魏碑甚至整个北朝碑刻没有不是佳作的，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认为“《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郑长猷》诸碑，雄强厚密，导源《受禅》，殆卫氏嫡派。惟笔力横绝，寡能承其绪者”^①，而在更多学者那里它被认为是《二十品》中书刻水平

艺术价值最低的作品之一，例如沙孟海先生（1987）认为，“碑版文字，一般先写后刻。历来论书者都未将写与刻分别对待。笔者认为，写手有优劣，刻手也有优劣。就北碑论，《张猛龙》《根法师》《张玄》《高归彦》写手好，刻手也好。《嵩高灵庙》《爨龙颜》《李谋》《李超》写手好，刻手不好。《郑长猷》《广武将军》《贺屯植》，写、刻都不好。”^②研究龙门石窟艺术的专家宫大中先生认为，“位于古阳洞窟顶的《郑长猷》《侯太妃造像记》和慈香窑的《慈香碑》，从其刊刻的自由无束、字句重复和字形笔画的不规范看，很可能是未经‘书丹’，由刻工直接捏刀向石，刊刻而成的。”^③

目前学术界研究北魏楷书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从书法风格、书法美学角度来研究，比如李云（2009）《龙门二十品造像题记书风成因探析》、王梦笔（2009）《北魏〈始平公造像记〉与〈石门铭〉摩崖比较研究——兼论北魏以后魏碑艺术的发展》、张羽翔（2010）《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书法研究》、顾涛（2011）《洛阳北魏墓志楷书书风的演变与分期》、郑文君（2012）《北魏书法艺术风格研究》、胡俊乐（2012）《北朝碑刻之风盛行原因考论》、范瑾（2013）《〈龙门四品〉与〈郑文公碑〉比较研究——兼及北魏书风的审美探讨》、许丞宗（2013）《北魏墓志书风探究》、白慧（2014）《〈始平公造像记〉书法之美试探》、卢蓉（2015）《传统墓碑书艺在现代墓碑设计中的流失及其反思》、胡愚（2015）《试探平城时期魏碑体书法》等；

第二，从汉语词汇角度研究，比如李红（2013）《北魏墓志词汇研究》、李红和周阿根（2011）《从北魏墓志看〈汉语大词典例证之不足〉》、吴兰兰（2012）《北魏墓志词语札记》等；

第三，从汉字构形角度研究，比如李涛涛（2007）《北魏太和年间碑刻楷书异体字异写字模式初探》、康晓峰（2011）《北魏社会发展与楷书兴盛论》、何山（2011）《魏晋南北朝碑刻隶楷书字形夹杂古文构件研究》、魏平（2012）《六朝墓志俗字的构件变化简析》、徐冲（2012）《从“异刻”现象看北魏后期墓志的“生产过程”》、贾忠峰（2015）《民间文化对楷书俗字构形的影响》、牛莉（2015）《文字学视野下的北魏墓志楷书》、卓佳乐（2015）《元氏墓志俗字研究》；

第四，从汉字字体角度研究，比如黄惇（2012）《从北魏造像题记看魏体楷书的写刻与形成》、朱桥（2016）《魏碑楷书的字体特征研究》等。

综上，目前我们见到的文献资料中从微观具体作品着手对以北魏为代表的魏碑碑刻内容、格式、字体、字用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而作为“龙门二十品”之一的《郑长猷造像题记》书丹和刊刻水平如何更需要从文字、书写等多角度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和评价。